

主雲五主編

人人文庫



普通教育

杜姜 佐 周琦 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杜佐周
姜琦 著

普通教育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復刊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前年冬間，商務印書館囑託佐周爲萬有文庫撰述普通教育一書；詎料尙未着手，而商務已不幸突遭一二八的浩劫，因遂中止！迄今春，商務早已復業，出版部諸先生復以撰述原書相託，且約於五月底交稿。孰知經答允後，佐周身體欠健，又加以課務繁雜，遲延至四月中旬，仍未執筆無已，商請同事姜伯韓先生代爲撰述一半，用二人名義發表。在未撰述前，二人共相討論編輯計劃，決由佐周起草第一、第四及第五三章，由姜先生起草第二、第三及第六三章。二人分途擬稿完後，又復相互校閱一次，求其先後一貫。閱月書成，得以如期寄出，這是佐周要向姜先生道謝的。書中參考國內外教育專家的著作處頗多，除在書末有申明外，特在此地再爲誌謝！

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，杜佐周序於廈門大學教育學院。

普通教育

目次

第一章	普通教育的意義及其源始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普通教育之歷史的根據和變遷·····	一〇
第三章	歐美日本學者對於普通教育的意見·····	三五
第四章	實施普通教育的機關·····	五六
第五章	普通教育與其他教育的關係·····	八〇
第六章	餘論·····	九七

普通教育

第一章 普通教育的意義及其源始

普通教育，是指一般的陶冶而言。在英，稱謂 *General Education*；在德，稱謂 *Allgemeine Bildung*；在日本，簡直稱謂「一般陶冶」。這種教育是與專門教育或職業教育相對立；其目的是在於發展人類身心兩方面的天賦，以爲各種職業的一般基礎。夸美紐斯（Comenius）說：「教育是全人的發展」；洛克（Locke）說：「教育爲謀身心發達的健全」；盧梭（Rousseau）說：「學爲人類之方」；裴斯泰洛齊（Pestalozzi）說：「教育的意思，是使所有的能力，爲自然的進步和有系統的發展」；福祿培爾（Froebel）說：「教育的目的，在乎真實的純潔的和神聖的生命的實現」；海爾巴脫（Herbart）說：「教育的目的，在乎產生平衡的多方的興趣」。這些都是指着普通教育或

一般陶冶而言的。要之，我們對於兒童設施一種教育，若其目的在於引起他們多方的興趣，發展他們身心的能力，以期他們具有完全優美的人格，就是叫做「普通教育」。其旨趣，是與專門的或職業的陶冶不同。蓋前者着重於普通的訓練，而其價值在於一般文化的陶冶；至於後者，則着重於特殊的訓練，而其價值在於實際生產能力的培養。可是這兩種教育的性質雖不同，但彼此仍有相當的關係。受了普通教育，若不繼之以專門的或職業的訓練，則個人必不免流為空虛淺薄，而毫無所能；或毫無所用；反之，若僅受專門的或職業的訓練，而毫無普通文化或品格的薰陶，則個人必將流為狹義偏頗，而缺乏共同的理想和一般行為的標準。故兩者應該互相調劑融冶，普通訓練當為特殊訓練的基礎。

在原始的時代，教育極其單純；其唯一的目的，僅求切合於直接的需要。因為當時的生活極其簡陋，故兒童的學習，只是隨同父母，出外漁獵，以供衣食；或在家工作，以禦敵人。除此以外，就無其他複雜學習之可言。在這個時候，根本無所謂一般的陶冶；其實亦毋需這種陶冶。等到後來，社會的生活日形複雜，文化的程度亦逐漸提高。如是，人類自然而然的覺得有受正式教育的必要。正式教育，

是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教育。年長的人，將文化積累的成績，傳達到年幼的人，使那些成績能夠繼續存在，不至於喪失與遺忘。自從這種正式教育開端以後，教育遂改變其意義。原始時代的教育，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工具，去滿足急切的需要；至於正式教育，則是一種設施，藉以延續與發揚社會的文化。因此，急切需要的滿足，反成為教育的附屬條件了。以後，變本加厲，教育竟與實際生活的需要相脫離，而成為一種特殊階級的權利；所謂一般的陶冶，不過極少數的富有和優秀的分子所得享受而已！這個特殊階級，就是當時治人的階級。他們為要維持他們的地位起見，自應備具相當的知識與才能。為了這種知識與才能的準備，故有普通正式教育的設施。他們既享有各種特殊的權利，衣食無虞，生活安閒；專門技藝的訓練，不特非為必要，且直視為鄙野的作業。總之，當時所謂普通教育，實可稱謂士大夫的教育。他們所從事的學問，大都為知識的訓練，品格的陶冶，和文學或藝術的欣賞而已；絕非為準備專門或職業的訓練的。上節所謂普通教育的目的，是在於發展身心兩方面的天賦，以為各種職業的一般基礎，乃是近代教育的新傾向，而非昔時普通教育的事實。

普通教育，亦可稱謂「文雅教育」或「自由教育」(Liberal Education)；其最初的起源，

遠在希臘。在希臘，教育最盛的，當推雅典。就社會的組織而言，雅典爲純粹的民主國，由市民中互選施政者以行政。但在市民之下，尚有平民和奴隸；故嚴格的說，雅典仍不脫離一種貴族的政治。因此，其所設施的教育，亦僅限於市民之間。主要的科目爲音樂和體操；另外教些算術、幾何、及天文等。至於實用的科目，卻不是市民所必修的學問。其實，當時的學校也沒有這種科目。便是他們所必修的音樂和體操，也並不是盼望這種學問的發達；實不過把牠們來做修養品性的工具罷了。「受教育的人所最盼望的，是內心的堅實、思想的豁達、和思慮的周密。所以一般都抱着教育即修養的觀念。以教育爲生活手段，那是平民的事，並非公民的事。」由此可知當時的普通教育，純粹是根據於陶冶主義，而與實際生產技能的訓練無緣的。

在中國，古代教育的理想，亦大抵如此。其代表的人物，當然就是孔子。孔子生在周室衰微的時候；當時各地的諸侯，擅自爲政，儼然成爲許多獨立的國家。其間有士大夫與平民兩大階級的區別，情形適與雅典相類似。最可異者，孔子所主張的教育，亦幾乎與雅典的教育如出一轍。孔子說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汎愛衆而親仁；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可見他是極端重視行爲的陶冶。在論語上，

載有「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」一段。這四項除「文」外，亦都是品性上的事情，而與生活教育不發生關係的。當孔子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」，雖亦注意到「藝」的教育；但這「藝」是包括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者，完全視為修養的工具，並非實用的科目。禮是社交，樂是音樂，書是識字，數是數學，射御乃是體操。這些科目，實與雅典市民所習的差不多。其非為實用的學科，我們看孔子所說，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！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！」兩句話，就可知道了。

孔子對於職業的訓練，不承認是屬於教育的範圍以內。當樊遲請學稼，孔子答他說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當他請學圃，孔子又答說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可見孔子的意思，以為職業應該從有職業的人那裏去學，用不着學校來代教育的。這種見解，亦完全與雅典教育的理想一致。孔子不特忽視職業的教育，而且對於生活上的實利，抱有極端的反對主義。所以他說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，耕也餒在其中矣，學也祿在其中矣；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又說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」又說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又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；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其他，讀其對於顏淵、子路、或子貢等言論，幾乎無處不表示他是完全着重於品性的修養，

而不注意實際生活技能的訓練的。

在昔時，孔子被崇推爲中國的萬世師表；其影響於中國的學術與文化之大，無人能比其什一。故中國數千年的教育，幾乎純粹以其學說爲一切設施的中心思想。重陶冶，輕實學。這種教育宗旨，直至最近實行新學後，而始逐漸改變。孔子學說的影響，有其益，亦有其害。其爲益處，在於文化的延續及禮教的統一。數千年來的古國，仍能繼續存在這風雲多變的世界上，未始不是孔教入人之深，一般陶冶發見巨大效力的緣故。至於其爲害處，則在於孔教薰陶的方式和標準過於呆板與一律，養成一般受教育者固守成規，不謀進取；徒尙虛文，不求實際。結果，以致科學落後，生活簡陋；數十年前的社會程序，幾與數十世紀以前的毫無少異！因此，無怪一與西洋各國相接觸，比較各種事業，都不如人；無形中與有形中，整個國家遂呈現一種崩潰不安的形態。這莫非是受了從前那種消極的個私的陶冶的餘毒。再者，孔教既不切合於實際生活的需要，故一般民衆遂感覺沒有均受這種教育的必要。結果，其能受教育的薰陶者，不過極少數的人而已。至今政體雖已改變，民衆均有受相當教育的必要；但是因爲從前教育政策的偏側，大多數人仍是文盲，不知教育的價值。要求一般教育

的普及，目前尚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呢！

昔時歐西的情形，頗與我國實行新學以前的情形相類似。在第十八世紀以先，歐西所謂一般的陶冶者，全爲中流以上的子女所專享，下級人民幾乎毫無領受這種教育的可能。惟至法美革命以後，政權始逐漸改操於平民之手；於是教育遂爲一般社會所注重。爲成人而設者，有成人教育；爲兒童而設者，則有義務教育。大都是着重於普通的訓練。同時，裴斯泰洛齊等倡言人性本無高下的分別，一切人類的基本能力與自然性的圓滿發展，皆有同樣的必要。教育家同聲附和；於是一般陶冶遂愈爲社會所重視。最近民本主義的思潮，日益發達；一般人民皆認爲處於同等的地位，不復有何階級區別之可言。因此，其在教育上所享受的權利，亦皆互相均等。古時社會中所有治人者用心不用體，被治於人者用體不用心；或勞心者受閒暇的教育，勞力者受勞動的教育等區別，亦均不復有存在的餘地了。其實，所謂普通教育或一般陶冶，至現在始名實相符，備具真正的意義。

關於普通教育的施行，尚有一個個性差別的問題，應約略提出討論一下。因爲有人往往根據個性之不同，遂信一般陶冶爲不可能。其實，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見解！人類個性的差別，雖是事實；

但是屬於量的方面，而非屬於質的方面的。普通教育，原是關於一般基本的薰陶，若非白癡，當無不能接受者。再者，惟因人類有個性的差別，故宜加以一般的訓練，使其有相同的理想、觀念、態度和良好的行為等，以謀在社會上互助合作，藉以固定民族的基礎，及增進共同生活的幸福。至於個人特殊的能力和興趣，自當盡量發展，以求充分的合理利用；但這是屬於專門或職業教育的範圍，而非一般陶冶的問題。我們上面講過，普通教育應為專門或職業教育的基礎。在民本主義的社會裏，無論何人，均宜經過這兩種相對立的教育。一方面盡量發展個性與利用個性；另一方面又盡量使個性社會化，使其成為社會上的優美分子。前者是專門與職業訓練的責任；後者則為一般陶冶的任務。我們所注重的普通教育，當然是這樣平民化的陶冶，而決非昔時那種階級式的教育。

上面我們已將普通教育的意義和其源始，詳為解釋；但從歷史上看來，這種教育每因各個時代的社會背景不同或前後學者的教育見解有別，而異其旨趣的。為要明瞭這種變遷的情形，則我們不得不再有一度歷史的檢討和各個學者之教育學說的搜求。現在為敘述便利計，特在下面另設兩章：第二章敘述普通教育之歷史的根據和變遷；第三章敘述歐、美、及日本學者對於普通教育

的意見。等到明白這兩方面的事實以後，再來討論設施普通教育的機關，及今後對於普通教育所應取的方針和設施。

第二章 普通教育之歷史的根據和變遷

如上章所述，普通教育就是「文雅教育」或「自由教育」的別名，並且含有「一般陶冶」的意義，已經明白了。現在若從歷史上考察，我們可以知道自古代起迄於近世紀止，全部教育史是受着普通教育的勢力所支配的。先述西洋罷，在希臘時代，所謂教育，不外乎是一種普通教育。詳細的說，希臘時代的教育，其目的祇在於陶冶人之所以爲人。然而當時所謂「人之所以爲人」就是說人的心身兩方面必須圓滿發達而成爲文雅優美之人格的意思；所以後人稱希臘的教育爲「審美的教育」。據德國教育史家維爾曼（Otto Willmann）的見解，希臘的教育，就是以求一切方面之精神的啓發爲旨趣之教育。由此可見希臘的教育，其目的祇在於使人成爲一個文雅優美的人，而與世俗上專爲衣食而奔走的人迥乎有別。惟其如此，故後人把希臘的“Liberal Education”，譯做「文雅教育」。這雖屬於意譯，但離義不遠，可稱爲恰當的。

如上所述，希臘的教育，既然是以求一切方面之精神的啓發爲旨趣之教育。因此，這種教育，不外乎要造成自由的人格。同時，從社會的觀點上講，希臘人視從事生產職業爲奴隸或半奴隸之事，而所謂自由民全然與實際生活問題相分離；換句話說，希臘的自由民除掉防禦國家外，終日無所事事，對於實際生活問題，不勞而獲，有多數奴隸或半奴隸會供給他們的；因此，他們把所有餘裕的時間都花費在所謂教育之上，對於事物要感到興味而愉快，或養成所謂德操之風。維爾曼又說過：「希臘人視教育爲一種裝飾品，而非實用的必需品；但是所謂裝飾品，並非物質的裝飾品，乃是人格的裝飾；換句話說，即陶冶品性，使人格具有優美的要素，就是教育。這種養成優美的自由民教育，並非出於強制的教授，乃是自由學習的；換句話說，即學生自動的去消融精神的內容，以增進自己人格之光。」惟希臘的教育，一方面既然以造成自由的人格爲旨趣，他方面又是專施於自由民，而奴隸或半奴隸不能染指，故後人把希臘的「Liberal Education」直譯做「自由教育」，亦可謂名實相副的。

現在我們姑不論希臘的教育稱做「文雅教育」也好，或稱做「自由教育」也好，實在講起